

從展示品到合作者：馮亞星、馮亞學與早期中德語言文化接觸*

柯 卉

摘要：19 世紀 20 年代，兩位廣東男子：馮亞星、馮亞學作為公開展示物在德意志地區出現，引發民眾對於中國人與中國語言的關注。在獲得普魯士王室資助之後，二馮在德意志生活多年，並受洗成為基督徒。有意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的德意志學者以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新約》譯本為漢語底本，約請二位華人合作編撰多種中德雙語文本。這部分中德文雙語文本並列漢字、羅馬字母拼音、《新約》德文，呈現字、音、譯三位一體的文本特點，可以推定此類文本編撰目的是說明德人實現漢字、漢語同步學習，而非此前學者所認為的幫助二馮理解基督教，或是加強德語學習之用。

關鍵詞：二馮、雙語文本、《新約》中譯本、漢語學習

1822 年，耶拿，一份名為《伊西斯》（*Isis*）的期刊登載了洛倫佐·奧肯（Lorenz Oken，1779-1851）的新聞報導——“兩名在德意志旅行的中國人”。一名“Aßing”，一名“Aho”。¹後世學者還原了兩人的身份姓名：兩人皆為馮（Fung）姓，一名馮亞星（1792/3-?）；一名馮亞學（1798-1877），分別來自廣州附近的香山與黃埔（以下提及兩人，簡稱“二馮”）。

二馮旅德多年，留下諸多有跡可查的存在印痕。德意志藝術家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為兩人測量頭圍，進而繪製了寫實人像素描；²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哈爾次山遊記》提及的“兩位中國人”；德意志文豪歌德據信曾與兩人晤面。除此之外，兩人名下還有數種中德雙語手稿文本存世。³儘管二位中國男子的知識素養，如德國學者史華慈（Rainer Schwarz，1940-2020）所言，不應當被定義為“學者”，⁴但該部分基督教內容雙語手稿佐證二馮參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早期中德語言文化交流史（1600-1800）”（項目批准號 21FSSB018）階段性成果。

¹ Lorenz Oken, „Ueber die zwei in Deutschland reisenden Chinesen“, in *Isis von Oken*, Heft XI, Jena: beyrn Herausgeber, 1822, pp. 417-432. 該篇報導中譯本：洛倫茲·奧肯：《關於兩位在德國旅行的中國人》，江雪奇譯，《國際漢學譯叢》，2023 年第 2 期，第 113-142 頁。本文隨後引用結合報導原文譯出。

² 參見 Cordula Gumbrecht, “Die Lutherbibel und der vermutlich erste Chinese Deutschlands”(13.01. 2017, in “Bibel-Thesen-Propaganda”), <https://blog.sbb.berlin/die-lutherbibel-und-der-vermutlich-erste-chinese-deutschlands>, 2024 年 3 月 5 日讀取。

³ 主要包括《新約·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及《路德小問答》，本文使用柏林國家圖書館、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藏本（數字資源）。

⁴ 史華慈對兩位馮姓男子進行了開創性的持續研究，參見 Rainer Schwarz, „Heinrich Heines ‘chinesische Prinzessin’ und seine beiden ‘chinesischen Gelehrten’ sowie deren Bedeutung für 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與過 19 世紀早期中德語言接觸交流。本文在評述二馮身份轉變的基礎上，重點辨析二馮與德方學者的學術合作以及兩人名下中德雙語手稿的編撰目的。此前學者推定該部分手稿之用或是幫助兩位中國人更好地理解基督教；或是為新教傳教士赴華宣教做準備，亦或是幫助二馮學習德語。⁵二馮與德方學者尚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的合作特點以及該部分手稿三位一體的編撰形制都顯示，手稿文本更可能的編撰目的是說明德方學者實現漢字、漢語同步的中文學習之用。

一 作為展示品的二馮

根據 1822 年奧肯的報導可知，這是馮亞星第三次遊歷歐洲，他原本計畫與族人馮亞學前往英國，“為的是到那裡見見世面，或是掙點錢。”後來在一名柏林“軍火商”兼“展覽商”拉斯特豪森（Lasthausen）先生⁶的建議下，兩人轉而登陸歐洲，開始遊歷德意志。⁷據悉，兩人赴德前與拉斯特豪森簽訂有合同，“根據合同，他們兩人必須環遊歐洲大陸並同意以收費形式公開展示。”⁸德意志人當時很少有機會見到活生生站在面前的中國人，普通民眾難免出於好奇心理，願意出錢購買門票“參觀”兩位中國人，拉斯特豪森有意開發這一商機。當時知識階層對此類展示“人”的行為意見不一，批評有之，參與有之。

1822 年的奧肯報導對此舉提出批評，稱商人設計的購票參觀方式在德意志地區無利可圖，理由是兩名中國人和德國人並無區別，都是兩條腿、兩個胳膊、一個腦袋，又不是說他們身上長有“蝙蝠的翅膀”，或是“蛇的尾巴”，抑或是“像鳥兒一樣發聲”。⁹但出於不同動機、心態，仍然有參觀者願意購票參觀。

柏林雜誌《耿直者》（*Der Freimüthige*）1823 年 3 月 8 日報導——“關於此地兩位中國人的報導”，出自一位興致勃勃參觀者的見聞。“3 月 3 日，周日，我滿懷希望前往貝倫大街，去看那兩位中國人——亞星和亞學。不過，我的期望嚴重落空。他們的確是中國人，但是不到五分鐘時間，他們能夠展示的東西有限。比方說在祭祀時以及與敵人對陣時表演的一種持續舞蹈。令人印

Sinologie“, in *NOAG* 144, 1988, S.71-94（《海涅的〈中國公主〉與他的兩位“中國學者”，兼論其對德國漢學肇端的影響》；Rainer Schwarz, „Noch einmal zu Heinrich Heines, zwey chinesischen Gelehrten“, 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64, 2016, S.173-200（《再論海涅的“兩位中國學者”》），是篇附錄整理了當時關於兩位旅德華人的報導與記載。以下凡引用上述兩篇論文，以中文標識作者名、注明論文發表時間及頁碼。

⁵ 幫助理解基督教或是為新教傳教士入華做準備——此兩種推論出自注釋④史華慈研究論文。幫助二馮學習德語之用的說法出自江雪奇研究論文（《最早留居德國的中國人馮亞星、馮亞學及其研究意義》，《國際漢學》，2021 年第 4 期，第 79-89 頁）。以下凡引用該篇論文，標識作者名、發表時間及頁碼。

⁶ Heinrich Lasthausen，“軍火商”兼“展覽商”，參見 Cordula Gumbrecht, “Die Lutherbibel und der vermutlich erste Chinese Deutschlands”.

⁷ L.Oken, „Ueber die zwei in Deutschland reisenden Chinesen“, S. 417.

⁸ Cordula Gumbrecht, “Die Lutherbibel und der vermutlich erste Chinese Deutschlands”.

⁹ L. Oken, „Ueber die zwei in Deutschland reisenden Chinesen“, S. 417.

象深刻的音樂。兩根調至相距五度的琴弦組成的一種樂器，琴弓夾在兩根琴弦之間，最多能拉出三至四種音調，且始終保持不變。他們雖然給眾人展示了中式帽子，但並沒有戴上，當然他們穿著是中式的”。¹⁰

到此為止，這位參觀者的記錄展示的還是與當時歐美普通民眾一樣的獵奇心態，¹¹ 隨後這位參觀者顯示出 19 世紀的德意志知識階層的普遍意識：兩名中國人很有用，因為他們的到來意味著德人有機會親耳領略漢語——世界上最獨特的語言之一。“他們寫的字想必是正確的，但說的話以及翻譯很可能有誤。因為他們不懂德語，更不會寫德文；雖說有一名德國人充當翻譯，但不能正確理解兩位中國人表達的意思：有一個字發音 ‘genoug’，譯為‘牛（Kuh）’。另有一個與它截然不同的字，同樣發 ‘genoug’ 音，譯為‘Stern（星辰）’”。¹²

奧肯之前對中國語言文字已經有相當認識，因此他更重視與兩位中國人直接交流的機會。“我感到非常驚訝，過去整整一年，兩個中國人都呆在德國，卻沒有一個人關心這種語言。在德國境內，還從沒有人感覺到，這個機會有多麼重要，即使不能完整瞭解中文，但也能夠獲知其精髓的機會。我與他們呆在一起的短短幾小時，和他們進行交談，已經足夠讓我至少獲得有關這種語言不同尋常的簡單易學特性。我進行了一項比較研究，比較巴耶爾與傳爾蒙的中文語法。遺憾的是，我發現，對於該語言的實質性結構以及精神氣質，我們仍然知之甚少。葡萄牙傳教士關於中文語法的介紹是艱難拼湊的產物，其基礎僅僅是一種猜想和美好的願景。人們必須首先區分口頭語與書面語。於我而言，學習書面語困難重重，目前為止還完全沒有頭緒，雖說這兩個中國人有不錯的書寫能力……。口頭語卻正相反，我感覺相當容易。我相信只要有相關的詞彙儲備，就能夠說中文。這是一種孩童用語，詞與詞之間互相移動，就像我們的孩子剛開始含糊不清說話時那樣”。¹³

奧肯當時似乎有意研究中國語言，其報導詳細記述此次與馮亞學、馮亞星晤面所瞭解到的中國語言以及中國文化知識。不過，奧肯上述介紹仍然重複著歐洲早期中國研究者的觀點，中文語法的與眾不同以及漢字發音單音節特色，同時強調中文口頭語簡單易學的特性。奧肯自陳不懂漢字組合規則，儘管如此，奧肯仍有意歸納中文語法要旨（Geist），諸如名詞不配備冠詞、沒有變格、沒有單複數變化，等等。如果奧肯當時有條件獲知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所著《漢語筭記》，相信可以消除很多疑惑。

17 世紀下半葉，勃蘭登堡大選帝侯（Friedrich Wilhelm, 1620-1688）圖書館中文圖書管理員繆

¹⁰ *Der Freimüthige oder berlinisches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gebildete, unbefangene Leser*(1823). 錄自史華慈論文（1988），第 88 頁，史華慈推測作者可能是庫恩博士（Friedrich August Kuhn, 1784-1829）。

¹¹ 林則徐在廣州期間任用了四名譯者，搜集世界資訊，編譯《澳門新聞紙》。其中廣東人“阿蘭”與“阿倫”旅美期間也曾作為“展品”公開亮相，此舉被有識者批評。參見蘇精（輯著）：《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導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 31 頁。

¹² “genoug” 粵音“牛”，德人譯者將其譯為“Kuh”或無誤。報導者不解同樣發音的另一個字為何釋為“星辰（Stern）”。筆者推測此處漢字或是與“牛”音近似的“紐”，指“紐星”。

¹³ L. Oken, „Ueber die zwei in Deutschland reisenden Chinesen“, S. 418-419.

勒 (Andreas Mueller, 16130-1694) 宣稱發明快速掌握中國語言的“中文秘訣”(Clavis Sinica)。雖然繆勒至死沒有公佈他的秘訣，但自此之後，瞭解並掌握中國語言的願望在德意志學者當中始終存在。兩位中國人的到來，在奧肯看來，有助於德意志學者的中文研究。“但是人們將會意識到，這兩位中國人對於科學而言多麼重要。拆分後的漢語構造，顯示了人類原初語言是如何形成的。它(漢語)是一處石堆紀念碑，工人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整理好，置於街巷和廣場，卻沒辦法用來蓋一座房子。中文或許是惟一得以保存的原初語言，包含了科學知識以及人類歷史。但願某個政府或某位有能力人士為這兩位中國人贖身，讓他們學習德語，以便將來通過他們掌握漢語”。¹⁴

馮亞星與馮亞學此後在德意志的不尋常經歷，與奧肯的構想不謀而合。

按照二人與展商簽訂的合同，他們要在全歐洲巡展，德意志之旅僅僅是開始。令人意想不到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 1797年-1840年在位)出資恢復了兩人的自由身，王室還提供了進一步經濟資助，讓兩人前往哈勒大學開始系統性的德語學習。17世紀勃蘭登堡大選帝侯渴望效仿鄰邦荷蘭，建立東印度公司。大選帝侯決心從文化層面為發展東方貿易做準備。大選帝侯的東方戰略思想，促成了德意志境內官方層面最早的中文圖書收藏，王室圖書管理員繆勒的“中文秘訣”研究也因此得到資助。腓特烈·威廉三世此番資助兩名中國男子，同樣是基於對華交往的考慮。

資助行動的直接建議者被認為是時任普魯士文化大臣阿爾騰斯泰因(Karl vom Stein zum Altenstein, 1770-1840)。¹⁵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士據信是哈勒大學神學家、希伯來語研究專家格塞尼烏斯(Heinrich Friedrich Wilhelm Gesenius, 1786-1842)。¹⁶兩位年輕博士：赫爾姆柯(Friedrich Ferdinand Helmke, 1801-1870)與尚特與二馮互為語言學習的老師和學生，歷時三年。詩人海涅當時的評述：“他們兩年前在柏林供人參觀，如今在哈雷被培養為中國美學的講師”。¹⁷

二 作為“老師”的二馮

馮亞星、馮亞學是普通中國民眾，至少在前往歐洲之前，沒有證據表明兩人是接受過系統文化教育的讀書人，或是正式受洗的基督教信徒。筆者認同史華慈觀點，即兩人並非有學識的中國學者。兩人來到德國之後，因為普魯士國王對東方的興趣，身份發生階段性轉換——在德國的中文老師和求學者，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專業人才，但肯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具有主動學習精神的“學者”。不過，馮亞星與馮亞學畢竟識字，且性情正常，學識方面或不及法國學者傅爾蒙(Etienne

¹⁴ L. Oken, „Ueber die zwei in Deutschland reisenden Chinesen“, S. 432.

¹⁵ 參見 Cordula Gumbrecht, „Die Lutherbibel und der vermutlich erste Chinese Deutschlands“.

¹⁶ 德國“文化部檔案”，轉引自江雪奇論文(2021)，第82頁，注釋⑤。

¹⁷ Heinrich Heine, *Die Harzreise*, S. 66. 中譯文參看[德]海涅：《哈爾次山遊記》，馮至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69頁，同頁注釋④：“1823年柏林大街上有兩個中國人展覽自己，參觀券每張銅錢六枚；後來又有人說那不是中國人，卻是奧地利人假扮的，是梅特涅派到普魯士的特務”。

Fourmont, 1683-1745) 的中文老師黃嘉略,¹⁸但與 18 世紀隨法國耶穌會士傅聖澤 (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663-1739/1740) 赴歐、最後變得“瘋癲”的中國隨從胡若望相比,二馮的服從性似乎更好一些。

根據德方的安排,兩位中國男子在哈勒接受了 10 個月神學相關教育,於 1825 年 5 月受洗成為新教教徒。¹⁹兩人在接受德語言學習的同時,利用“特長”——說中文(實際為廣東方言)、識漢字,開始與德意志學者開展漢語方面相關合作。二馮在哈勒期間的德語老師之一尚特,於 1832 年書面求職腓特烈·威廉大學(初名柏林大學,今名柏林洪堡大學),信中寫道:“還在我博士畢業(1823 年)之前,我在格塞尼烏斯博士的建議下,與當時另一位年輕的哲學研究者,現在斯塔加德(Stargard)的赫爾姆柯校長,指名為兩位中國人的學生和老師,在哈勒互相學習教導,歷時三年。我們把最好的時間用於學習奇怪且艱難的中國語言,特別是因為兩個地道的中國人比所預想的更加無知”。²⁰

當時旅居巴黎的德意志東方學家柯恒儒(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冷眼旁觀年輕的尚特利用兩位中國合作者增進中文水準的美好期許。1828 年,柯恒儒以筆名威廉·勞特巴赫(Wilhelm Lauterbach)出版專冊《論威廉·尚特博士所謂譯自原文的孔子著作譯本——一個文學上的欺騙》(*Dr. Wilhelm Schott's vorgebliche Übersetzung der Werke des Confucius aus der Ursprache, eine litterarische Betrügerei*),批評尚特的《論語》德文譯本。著作前言:“人們必須清楚,這兩名中國人,就是再普通不過的男子,來自廣東周邊村莊,其中一人做過廚師,他們為一個投機商服務,像野生動物那樣供歐洲人付錢觀看。大家可以想像,這樣的人會是怎樣一種出類拔萃的學者。這個世界上有誰會想讓一名來自不來梅郊區的農夫,或是一位漢堡的挑夫充當德語專家,並請他們解讀、注釋萊布尼茨或是康德的作品”?²¹

尚特為此撰寫辯駁專冊,名為《澄清所謂威廉·勞特巴赫的不實隱射》(*Abfertigung der verleumderischen Insinuation eines angeblichen Wilhelm Lauterbach*),聲稱自己在兩名中國人、語法書以及字典的說明下,耗費時間與精力揣摩孔夫子箴言的內涵。²²該篇辯駁文描述了雙方合作的場景。“在我準確瞭解這句令人困惑的箴言之前,一個盛放磨好的墨汁的碗傾倒了,原文和翻譯文字泡在了裡面。只有少數幾個字……還能夠辯認。我那位年長的中國人,兒時記背過四書,現如今不

¹⁸ 黃嘉略隨法國傳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ee, 1655-1713)赴歐,後旅居巴黎,參看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¹⁹ *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 Berlin, Nr.118(Mittwoch, 25. Mai 1825), p.472. 轉引自史華慈論文(2016),第 195 頁。

²⁰ 錄自史華慈論文(2016),第 181 頁。

²¹ Wilhelm Lauterbach, *Dr. Wilhelm Schotts vorgebliche Uebersetzung der Werke des Confucius aus der Ursprache, eine litterarische Betrügerei*, rei Ponthieu, Michelsen und Copm., 1828, Einleitung: 11.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藏本(數字資源)。

²² Wilhelm Schott, *Abfertigung der verläumderischen Insinuation eines angeblichen Wilhelm Lauterbach*, die Renger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1828, S.7.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數字資源)。

得不通過回憶來補足。思忖多時，他拿過毛筆，寫下了以下句子，看起來不太有孔夫子的文風，但我也沒有其他更好選擇”²³

1826 年，肖特《論語》德譯本第一部分出版，²⁴序言中稱“與兩位本土中國人的三年交往，意義非凡。”²⁵ 同年，肖特完成 25 頁篇幅的拉丁文論文《論漢語本質》(*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²⁶。魏漢茂 (Hartmut Walravens) 回顧德語區中國研究的論文中稱，肖特一度想前往巴黎學習，但缺少必要的途徑，“儘管他在哈勒通過了東方學教授資格，在他指導兩名中國人多年以後，又在柏林通過了漢學教授資格”²⁷

1857 年，肖特在柏林出版《漢語教程：用於授課或自學》(*Chinesische Sprachlehre,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m Selbstunterricht*)，成長為 19 世紀德意志地區頗具聲名的東方學家、中國語言專家。

反觀肖特的“學生和老師”馮亞學、馮亞星。二人赴歐不是為了求學，²⁸旅德期間大概也從未考慮從事德語文研究或是某個學術領域的研究。馮亞學在德國終老，後半生主要是服務普魯士的王室，司茶房之職因為工作勤勉，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 1840-1861 年在位) 讓其御用建築師為亞學設計了有中國風格的住宅，至今猶存。²⁹馮亞星則在 1836

²³ Wilhelm Schott, *Abfertigung der verläumderten Insinuation eines angeblichen Wilhelm Lauterbach*, S.

20. 年紀稍長的馮亞學當時所寫拼音，經史華慈還原為漢字：臧文仲栽葵於田，栽藻於其屋也。可謂君子乎。《論語》原文：“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知其如也。”參見史華慈論文 (2016)，第 184 頁。

²⁴ *Werke des tschinesischen Weisen Kung-Fu-Dsü und seiner Schüler, zum Erstenmal aus der Ursache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und mit Amerkungen begleitet*, Rengerschen Verlag-Buchhandlung, 1826. 德國漢學家葉翰 (Hans van Ess)：“1821 年以來，肖特在哈勒學習東方語言，並且收了兩位中國學生。他已經完成關於 *Arabo-Islamic Sunna* 的博士論文，1826 年的教授資格論文是孔子《論語》的首個德文譯本。” Hans van Ess, “History of Pre-Modern Chinese Studies in Germany,”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Vol. 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491-524, here p.494.

²⁵ *Werke des tschinesischen Weisen Kung-Fu-Dsü und seiner Schüler*, Vorrede. S.VII-VIII.

²⁶ 論文全名 *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 dissertatio: quam annuente amplissimo philosophorum ordine pro venia legendi, linguasque et litteras orientales docendi in academia Fridericiana publico doctorum examini submitte die XVII. Maii M DCCCXXVI auctor Gulielmus Schott Philos. Doct. Art. Liber. Magister*. (Halis Saxonum[Halle/Sachsen]: Renger, 1826) 牛津大學波德利圖書館藏本。

²⁷ Hartmut Walravens, “Zur Geschichte der Sin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S.1-15, hier S. 3. <https://docslib.org/doc/7869978/zur-geschichte-der-sinologie-im-deutschsprachigen-raum-von-hartmut-walravens>. 2023 年 12 月 28 日讀取。

²⁸ 方豪編撰的同治前旅歐留學者名錄上，並無馮亞學與馮亞星的姓名。或許是編者不掌握資訊；或許是編者認為兩人赴歐原因並非求學，屬於“志在逐十一之利，于文化交流，無足稱述”之輩。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年，第 379-401 頁，此處第 379 頁。

²⁹ 史華慈論文 (1988)，第 106-107 頁。

年離開歐洲，輾轉返回廣東後又再度離鄉遠洋，最後的命運不得而知。³⁰

三 二馮“創作”的雙語文本

儘管馮亞學、馮亞星的學術修養有限，但在哈勒、波茨坦居留期間，應德方的要求，兩人仍然勉力參與多種基督教內容中德文對照雙語手稿的編撰，目前存世的手稿文本包括：路德《新約·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羅馬書/哥林多前書》雙語文本以及《路德小問答》雙語文本。³¹

依照柯恒儒 1828 年的批評，馮亞學、馮亞星的中文修為不足以翻譯儒學典籍。母語尚且如此，以二馮所接受的短期德語學習和神學培訓，似乎更不足以翻譯路德《新約》。學界一般認為二馮手稿漢字內容源出新教在華傳教先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新約》中譯本。

馮亞學名下《新約·馬可福音》《新約·羅馬書》《新約·哥林多前書》中德文對照手稿，中文篇名與正文內容都包括三種語言形式：德文、漢字、羅馬字母拼音（廣東方言，非官話，標注聲調）。其中，右欄為德文，黑色字體手寫體工整清晰，與 1800 年版路德《聖經》德文本文字完全一致；左欄中文字，分為六列，豎排直寫，紅色字體，文字幾乎完全摘抄自馬禮遜《新約》中譯本，僅有個別文字差異以及少量謄寫錯誤。³²黑色羅馬字母為漢字的廣東方言發音拼讀。

1828-1829 年，馮亞星完成《新約·馬可福音》《新約·路加福音》中德文對照手稿，同樣由德文、中文、拼音三種語言形式組成，體例與馮亞學手稿有所區別：中文與德文皆按照歐洲字母文字習慣橫排，從左至右行文。每頁分為 10 欄，每欄內有三行文字，從上至下依次是：紅色中文字；黑色羅馬字母拼音；黑色德語部分文字，採用 1800 年路德《聖經》德文本。³³

³⁰ 馮亞星生平資訊，參看江雪奇論文（2021），第 83 頁。一說 1889 年，逝於中國，參見 Cordula Gumbrecht, “Die Lutherbibel und der vermutlich erste Chinese Deutschlands”, 該說出處不詳。

³¹ 哈勒教會檔案館收藏亞星、亞學錄入的未編序聖經章節。柏林國家圖書館收藏有馮亞學“譯”路德《新約·馬可福音》；亞星“譯”《新約·馬可福音》、《新約·路加福音》以及《路德小問答》一部。梵蒂岡圖書館收藏有馮亞學所譯《舊約·羅馬書》《舊約·哥林多前書》（《與羅馬輩書》《與可林多輩第一書》）。本文引用的二馮雙語手稿，如無特殊說明，皆出自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不再逐一標注。

³² 明清在華天主教教士最全面的《聖經》譯本是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譯《古新聖經》，手稿本。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譯本被認為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巴設譯本》（巴黎外方傳教會白日升（Jean Basset, 1662-1707）《聖經》譯本《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1700 年左右完成）。1813 年，馬禮遜譯《新約》出版，名《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刻印 2000 冊，所使用的《聖經》底本包括：公認經文、英王欽定本、蒙塔努譯本、武加大譯本、七十士譯本等。1817 年，馬禮遜在馬六甲刻印出版《我等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1823 年，《聖經》中譯全本《神天聖書》刻印出版。參看趙曉陽：《二馬〈聖經〉譯本與白日升〈聖經〉譯本關係考辨》，《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41-59 頁。

³³ 筆者比對兩人手稿德文部分與 1800 年路德《新約》，除個別單詞大小寫有別，幾乎是直接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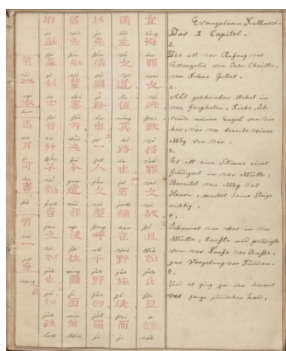


圖 1 《馬可福音》馮亞學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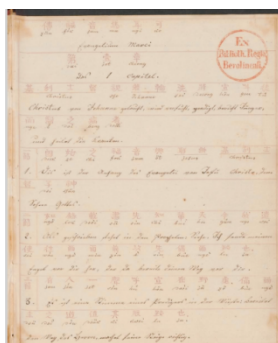


圖 2 《馬可福音》馮亞星手稿

與馮亞學名下的中德雙語文本相比，馮亞星手稿的中文部分雖然同樣基於馬禮遜《新約》中譯本，但沒有直接抄錄，而是依據德文詞義對應漢字詞彙，文風及譯詞難免怪異。

《馬可福音》1:14，馮亞星手稿中文部分出現文字“惟後若翰可答被入囚”，逐字對譯“Nachdem aber Johannes überantwortet war”。《新德漢詞典》及物動詞“überantworten”解釋有二：文雅的書面用詞，意即委託、託付；法律用詞“送交”，例如“將一名犯人送交法庭審判”。³⁴馮亞星很可能注意到“überantworten”的詞根“antworten”，該詞含義“回答”“作答”，所以在馬禮遜中譯本“入囚”之前添加“可答”二字。³⁵《馬可福音》1:16 節馮亞星手稿本，馬禮遜中譯本中的漢語助詞“夫”被擴譯為含義不明的“即其惟”，究其因同樣是追求與德文《聖經》“Da er aber”逐一對譯。

除了《新約·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章節雙語對照手稿，馮亞星名下尚一部約百頁的小冊子，內容包括《路德小問答》³⁶並《新約》章節條目選錄。《路德小問答》首頁手寫體德文說明：“Der kleine Catechismus Lutheri nach der deutschen und mit den Chinesen Charaktere Uebersetzung, von Chinese Feng Asseng, in Stadt Potsdam, im Jahr 1828”（中譯“《路德小問答》，依通行德文底本譯出，附有漢字，唐人馮亞星，波茨坦，1828 年”）。

³⁴ 潘再平主編：《新德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第 1194 頁。

³⁵ “Nachdem aber Johannes überantwortet war”，見於 19 世紀德語區路德《新約》通行版本 *Canstein-Bibel*，參見 Sven Bigl, “Von der Reformationszeit bis 2017. Die Revisionsgeschichte der Lutherbibel,” in „...und hätte der Liebe nicht“ *Die Revision und Neugestaltung der Lutherbibel zum Jubiläumsjahr 2017: 500 Jahre Reformation*, Hannelore Jahr(Hrsg.),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2016, S. 31-41, hier S. 33。

³⁶ 《路德小問答》首度出現於 1529 年，包含：十誡、信經、主禱文、聖洗禮、聖餐禮、晨間及晚間禱詞、飯前祝禱與飯後謝恩。<https://bible.fhl.net/gbdoc/luther/luther14.html>. 2021 年 9 月 1 日讀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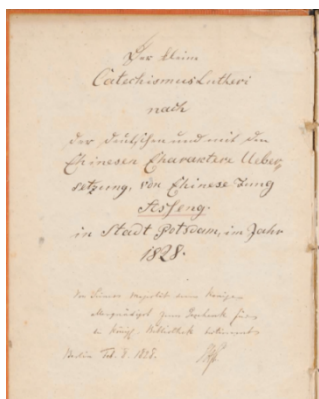


圖3 《路德小問答》馮亞星手稿 卷首頁

下端顏色略淺的手寫體文字注明：“Von seiner Majestät dem Könige allergnädigt zum Geschenk für die königliche Bibliothek bestimmt. Berlin Feb. 8. 1828”（中譯“國王陛下御賜王室圖書館，柏林，1828年2月8日”）。

據此大致可以推定該文本在進獻普王之後，旋即交付王室圖書館收藏。

《路德小問答》第一部分漢文標題“以第壹卷與其十誡神”逐字對譯德文標題“Das erste Hauptstück. Von den zehn Geboten Gottes”，並不考慮中文語序以及達意與否。手稿中的“十誡”同樣採取逐字對譯形式，無法完全達意。

有學者將馮亞星手稿中文神學詞彙，如“聖神”“聖風”與馬禮遜譯本對比，認為馮亞星對神學詞彙自有理解。此說有誇大之嫌。馮亞星對基督教神學以及神學概念並沒有形成系統認識。例如，“der Geist”（the Spirit）與“der heilige Geist”（the holy Spirit），馬禮遜譯本分別譯為“神風”與“聖神風”，手稿中“der heilige Geist”有時寫成“聖風”（《馬可福音》1：8）；有時寫成“聖神風”（《馬可福音》3：29；13：11）；《路德小問答》第二部分第二小節，“der heilige Geist”被譯成“聖仙”。

馮亞星欠缺學術訓練，對譯詞選用沒有系統的考慮，擇取基督教神學詞彙譯名的隨意性，在《路德小問答》手稿中多有體現。儘管根據現有文獻資料，未發現比馮亞星手稿《路德小問答》更早的中譯本，但《路德小問答》手稿第三部分“Vom Gebet des Herrn/ 與拜之主”《主禱文》文字顯然出自馬禮遜《新約》譯本。

馮亞星手稿《主禱文》中文：

我等父者 爾是在天

第一求 爾名成聖 第二求 爾國就至

第三求 爾旨成行於天，如亦於地

第四求 我爾日用糧 賜我今日

第五求 而赦我我等債，如吾赦我等負債者

第六求 又惑我勿等人誘惑

第七求 乃救我於兇惡

蓋爾為以國，又權者，又榮者，於世世 亞孟

馬禮遜《新約》譯本（《馬太福音 6：9-13》）《主禱文》：

我等父在天者，爾名成聖，爾王就至，爾旨成行于地如於天焉。賜我等以日用糧，
赦我等負債，如我赦負債我等者也。勿由我等入誘惑，乃救我等出兇惡。蓋爾為之國者，
權者，及榮者，於世世。啞口門

馮亞星在已有中譯文的基礎之上，進行了有限的幾處再創造，包括忽略《新約》德文單複數文法。馬禮遜譯本“我等”，德文對應“Unser”，《路德小問答》手稿皆譯為單數“我”。

《路德小問答》是該部手稿的前部分，手稿後半部分摘譯《新約》章節，共計 98 條目。包括“希比留第一章一到二”“若翰第八章十二”“與羅馬第一章二十”“牙可百第一章十七”，等等。中文文字基本抄錄自馬里遜《新約》中譯本。學者們此前皆已指出，馮亞星名下基督教內容中德文雙語文本的譯文水準不高，《路德小問答》手稿同樣如此。

以上是對目前留存二馮基督教內容中德雙語手稿的基本概述，就中文部分而言，與馬禮遜《新約》中譯本高度接近。1824 年馮亞學在哈勒開始雙語手稿抄錄工作之際，案頭很可能擺放有馬禮遜《新約》中譯本卷冊。

尚特 1826 年論文《論漢語的本質》（*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 Dissertatio*）當中提及馮亞學、《新約》中譯本和路德《聖經》德文本。“《新約》中文版本的作者將希臘單詞 *τάλαντου* 寫成英語發音的 Sterling，漢字寫作 s ī -te-ling。我的學生亞學，廣東人，通過與路德《聖經》德文本對照，很快讀出這個詞 Sterling 的發音，根據建議，譯者們辯認出其中的特別發音”。³⁷

馬禮遜《新約》譯本刊於 1814 年，新舊約合本《神天聖書》於 1823 年在馬六甲出版。1823 年，完成《聖經》中譯的馬禮遜返回英國休假，與歐洲知識階層的互動交流是馬禮遜此行的主要工作之一。歐洲各國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或促成《新約》中譯本在哈勒出現。

1830 年代，德意志東方學家諾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赴廣州採購中國圖書。諾依曼的購書之旅為柏林王室圖書館提供了在華新教傳教士，如馬禮遜、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等人的中文宣教作品並新教《聖經》中譯本。在此之前，柏林王室圖書館並未收藏新教《聖經》中譯本。³⁸1840 年尚特編撰《禦書房滿漢書廣錄》，其中“傳教士著述、譯著”部屬收

³⁷ Guilielmus Schott, *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 Dissertatio quam Annuente Amplissimo Philosophorum ordine pro Venia Legendi, Linguasque et Litteras Orientales Docendi in Academia Fridericiana Publico Doctorum Examini Submittet*, 1826, p.13. 尚特與赫爾姆柯與二馮互為語伴，開展語言互助式學習。此類學習活動是尚特的老師格塞尼烏斯“中國語言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的實施詳情參見江雪奇：《從語言項目到文化歸化——19 世紀初威廉·格賽尼烏斯的首個漢德雙向教學試驗（1823-1825）》，《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25 年第 5 期，第 54-65 頁。

³⁸ Julius Klaprot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錄各類新教教義問答手冊及多種《聖經》中譯本，包括《神天聖書》全本 20 冊（1828 年版，1832 年再版），並不注明《神天聖書》譯者身份。³⁹

四 二馮名下雙語文本的用途

兩位學養水準不高，本是為了見些世面、掙些錢財來到歐洲的中國男子，為何要編撰此類具有語言學、翻譯學特性的基督教內容中德文雙語文本？

史華慈此前推測馮亞星完成的雙語對照工作是應德方的委託，只是不確定委託方身份。“是一位波茨坦的宮廷牧師給普魯士國王提的建議嗎？目的是推動對華福傳。或者是腓特烈·威廉·亞星的施洗牧師這樣說過，與被動的接受口頭講解相比，通過高強度的翻譯工作，他的異國受洗者能夠更好的領會基督教？”⁴⁰

筆者以為上述兩種推測皆不成立。二馮中德文對照手稿的用途不太可能是為推動新教對華福傳之用。在新教《新約》中譯本已經出版的情況之下，依託兩位學養不夠的中國人再度翻譯中文宣教文本，於邏輯上不符。何況史華慈在做出第一種推測的同時，狠批二馮的能力不足以勝任路德《聖經》中譯工作。“他的翻譯如此奇怪，若是人們用它來教說中國人皈依，那是完完全全沒有可能。他從來沒有搞清楚過，翻譯究竟是什麼，他無視所有的語法，大費周章地把所有的德語句子與中文嚴格對應。委託腓特烈·威廉·亞星這樣的翻譯工作，顯然高估了他的能力，輔助威廉·尚特翻譯儒學典籍的工作，也是如此”。⁴¹

相較而言，史華慈的第二個推測更合理一些。高強度的參與翻譯工作，或許比單方面的灌輸，更容易讓兩位中國新教徒更好的領會基督教。但是，如果僅僅是為了讓兩人更好領會基督教，他們的翻譯工作只需要漢文與德文對照即可，為何二馮手稿中會出現與漢字逐一對應的羅馬字母標音，且貫徹始終？

二馮手稿用途第三種推測：為了學習德語而完成的家庭作業。⁴²該推測同樣無法解釋手稿中貫徹始終的以羅馬字母逐一拼讀漢字的做法。倘若只是為了二馮兩人學習並鞏固德語成效，二位母語為中文且識文斷字的國人完全不必要耗費時間將漢字（廣東方言發音）逐一進行羅馬字母拼讀。

馮亞學雙語對照手稿《馬可福音》可以確定完成於 1824 年，三種語言形式：漢字、羅馬字母拼音、德文並立於同一頁面。紅色的中文字用為軟筆所書，當是馮亞學手筆。流暢的硬筆羅馬字母拼音字母以及德文手寫體路德《聖經》文字，似乎不太可能是德語學習不足兩年的馮亞學所抄錄！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Königlich Druckerei, 1822.

³⁹ 《禦書房滿漢書廣錄》*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Die Druck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40, S.111.

⁴⁰ 史華慈論文（1988），第 101-102 頁。

⁴¹ 史華慈論文（1988），第 102 頁。

⁴² 江雪榮論文（2021），第 84 頁。作者認為手稿可能是二馮為學習德語完成的“某種‘家庭作業’”。

更可能的抄錄者是與二馮互為語言學習老師的兩位德國學者——年輕的尚特與赫爾姆柯。完成於 1823-25 年間的《羅馬書》，硬筆手寫體字母文字與此前《馬可福音》接近，疑出自同一人之手。馮亞星中德文對照手稿完成地點在柏林附近波茨坦，時間大約在 1828-1829 年前後。同樣是漢字、羅馬字母拼音、德文三位一體並立，馮亞星用軟筆完成紅色中文字，兩種字母文字與馮亞星手稿本字體有所區別，其中德文字母多連筆書寫，不易辨識。

二馮多部手稿一個顯著的共同特徵是三位一體文本形式，尤其是所有中文字皆對應有羅馬字母拼音。17 世紀-19 世紀以來，歐洲人編撰的供學習中國語言之用的工具辭書，例如明末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完成的《葡漢字典》、西班牙傳教士迪亞士（Francisco Diaz, 1606-1646）完成的西漢雙語字典⁴³、德意志中國研究學者門采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的簡易版拉漢雙語字典，等等，基本模式就是三種語言形式並存：漢字詞彙、羅馬字母注音以及對應的歐洲語言詞彙。再如，18 世紀德意志中國語言研究學者巴耶爾（T.S. Bayer, 1694-1738）所著《漢語博覽》包括數千個中文字，每個漢字都以羅馬字母注音並提供釋義。為了方便讀者查找字、音以及釋義，巴耶爾將著作分為兩冊出版。“這不是一本大部頭書，我只是想印成兩卷，這樣一些雕版刻字能被收錄，讀者也就能輕鬆的形成他自己的觀點。……我想也許會有一些讀者，他們希望查對表格，（兩卷本的話）表格頁就可以一直打開著，笨重的單冊本很難做到這一點”。⁴⁴

設想一下，對於中國人學習德語而言，需要標識的應該是德語單詞發音，而不是母語的發音。⁴⁵只有為了有利於德國人學習中文發音，才需要為漢字標注羅馬字母拼音。中文有二套系統：書面語（漢字）與口頭語（漢語），通過明清來華耶穌會士豐富的中國著述，已經被歐洲學者普遍瞭解。明末以來進入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需要在儘量短的時間內掌握所在地區的語言，以便開展宣教工作。為了幫助新來者學習漢語，前輩耶穌會士編撰的中文文本，往往採用羅馬字母為中文字標注發音。葡萄牙耶穌會士羅儒望（Juan da Rocha, 1566-1623）編譯面向基層民眾的宣教文獻《天主聖教啟蒙》：“是編原為喬治（Mare Gerge）神甫而以卡爾蒂拉（Cartilha）名者所撰之葡萄牙文教義綱領，如望僅將其轉為華言。”⁴⁶保存在耶穌會羅馬總會檔案館的《天主聖教啟蒙》版本頁面上多

⁴³ 中文名“蘇芳積”，參見“Old Manuscript Dictionaries of Chinese: New Connections through the work of Francisco Diaz and Appiani's Copy”, <https://www.leidenspecialcollectionsblog.nl/articles/old-manuscript-dictionaries-of-chinese-new-connections-through-the-work-of-francisco-diaz-and-appianis-copy>, 2025 年 5 月 2 日讀取。

⁴⁴ Knud Lundbæk, *T.S. Bayer(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ö: Curzon Press, 1986, p.93.[丹]龍伯格：《漢學先驅巴耶爾》，王麗虹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第 91-92 頁。此外譯文有文字改動。

⁴⁵ 《華夷譯語》是傳統朝貢體系下的對外交流必要的外語類工具書，乾隆朝編撰《華夷譯語》增加六種歐洲語言與漢語對譯詞彙表，其中包括《額呼馬尼雅語》（德語）。該部德漢雙語詞匯表當中並立兩種文字：漢字與字母，構成漢字詞彙、德文對譯、德文發音（漢字擬音）。

⁴⁶ [法]費賴之（Louis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標注羅馬字母拼音，部分還有拉丁文釋義，能夠幫助編譯者本人或其他使用該文本的歐洲傳教士正確讀出漢字。⁴⁷

馬禮遜譯《新約》中譯本的推出，根本目的是為了漢字文化圈宣教之用，譯本為純粹的單語本，沒有附錄英文，無法同時兼具雙語學習語言樣本之用。⁴⁸獲知馬禮遜《聖經》譯本資訊並在第一時間得到《新約》中譯本實物的德意志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對在華傳教工作或是東方語言研究感興趣的學者，甚至可能就是尚特在哈勒大學的導師格塞尼烏斯。

一種合理的推測：格塞尼烏斯有意發揮《新約》中譯本的價值，創設一種將馬禮遜《新約》中譯本與路德《新約》德文本部分章節互為對照的雙語文本，功能類似于此前來華傳教士學者以及歐洲本土學者編制的漢語學習工具書。當時阻礙該計畫實施的最大困難恐怕是德意志境內乃至歐洲很少有學者能夠認識數量如此之多的漢字。歐洲首位漢學教席獲得者、法國學者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以及旅居巴黎的德意志學者柯恒儒或許有這個能力，但目前尚未有證據表明，這兩位學者關注過馬禮遜《新約》中譯本。此時，馮亞星、馮亞學恰巧出現。兩位識文斷字的中國人在接下來的數年時間，接受德方資助，作為中文專業人才留居德國，接受各項安排，包括創設中德雙語對照文本。

無獨有偶，1832 年尚特《論語》德譯本第 2 部分出版。出於節約成本考慮，與第一部分一樣，仍然沒有印製中文字。但是尚特在德語譯文之外，增加了逐字對譯中文的拉丁單詞：“為了應對新的對於本人獨立性的誣衊，我這次在開放式的德語轉譯之外，添加拉丁文與漢文的對譯，此種對譯嚴格按照中文文本的中文字順序排列。希望此舉在提高這本書於讀者的實用性之外，還能提高對於中文初學者的實用性。”⁴⁹尚特以拉丁文逐字對譯中文字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提供中文典籍中譯本的基礎上，為中文初學者提供一種簡易版雙語工具書（儘管中文字缺位），提供中文初學者學習中文之用。將此類無法流暢表意的雙語對譯文本作為語言初學者的工具書，與二馮名下基督教內容中德雙語手稿的創作思路如出一轍。

假如我們不把兩位旅德中國人馮亞學、馮亞星視為路德《新約》章節、《路德小問答》的所謂譯者，不將兩人名下的中德雙語手稿視為譯作，而是將此類手稿視為應德方學者所請，為幫助德意志人，特別是準備入華宣教的新教傳教士更好掌握中文而編撰的中文教學、自學文本，那麼，所有令人費解之處可以獲得合理解釋。

現存二馮路德《新約》章節及《路德小問答》，雖然是手稿本，但形制規範，有條不紊開展三

72 頁。

⁴⁷ [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等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 冊，臺北：利氏學社，2002 年，第 377-514 頁。

⁴⁸ 馬禮遜推出《聖經》中譯本的同一時期，還陸續編撰漢語學習語法書和工具書，如《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以及《華英字典》（1815 年推出第 1 冊），同時代的德意志地區學者，似乎不掌握此類中國語言研究成果。

⁴⁹ Wilhelm Schott, *Werke des tschinesischen Weisen Kung-Fu-Dsü und seiner Schüler*, Vorrede, S.5-6.

種語言形式的比對。較早完成的馮亞學手稿中文聖經中文字與拼音並列在左欄，德文聖經文句列在右欄，中德文聖經篇章分別開列，使用者的視線需左右移動，才能比對三種語言形式的經文。待到 1828 年以後的馮亞星手稿，排版形式有所調整，經文篇章識別欄位在左邊窄欄，右邊寬欄實現三種語言形式同框，查找比對更為便捷。理想的狀態是：借助紅色中文字與德文的對譯，他們的德國學生能夠學會書面漢語；借助羅馬字母拼音，他們的德國學生能夠學會開口“說”中文，即掌握口語。

1828 年肖特反駁柯恒儒批評意見的文章中，提及兩位中國合作者所說的語言。“對此我有自己的觀點，不是因為我要用廣東方言來書寫漢字，而是因為我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官話發音都可以在廣東方言中找到。特別是馮亞學所說的黃埔話，較之香山話更接近官話”。⁵⁰

然而，字詞對譯的語言學習方式，對歐洲人學習其母語以外歐洲語言或許有效，卻很難適用於語法體系完全不同的中文學習。如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所說：“如果我能確切地把握漢語文本的獨創性，那麼也許可以這樣說：在所有的語言中，漢語文本的翻譯最難以再現出原文特有的表現力和句子的構造方式。”⁵¹作為有一定漢字識讀能力，與普魯士宮廷有良好交往，並且有可能與二馮處於同一時空的語言學家，威廉·洪堡的漢語研究論著中隻字未提兩位旅德華人所從事的與中國語言相關工作，或可間接證明此類嘗試掌握中文的方式未獲得當時語言學專業學者的普遍認同。

結語

19 世紀之前旅歐並且留下文字記錄的中國人數目有限，身份特別，其活動軌跡也大多局限於歐洲南部的教會圈或貴族圈，歐洲北部、西部普通民眾對中國人的瞭解很少。“與 1500-1800 年間數以千計的歐洲傳教士和商人來華不同，到訪過歐洲的中國人（全是男性）總數不超過二三百人，且大多是去羅馬和那不勒斯參加相關的宗教活動。實際上，很少有中國人在歐洲北部出現，即使在倫敦和巴黎這樣的大城市也不例外。”⁵² 馮亞星、馮亞學在 19 世紀 20 年代的德意志地區引發的新聞效應大體與此有關。當時的德意志知識階層視之為一個瞭解、學習中文的難得機會。18 世紀以來，法國學者取代德意志學者成為歐洲中國語言研究的主力。兩位中國人的到來，讓德意志學者看到提升中國語言研究領域話語權的可能。因為普魯士宮廷的外交意向以及德意志學者對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的興趣，二位中國男子的用處很快發生變化。他們從滿足淺層好奇心的公開展示物轉

⁵⁰ Wilhelm Schott, *Abfertigung der verläumdenden Insinuation eines angeblichen Wilhelm Lauterbach*, S.11-12.

⁵¹ [德]威廉·洪堡特：《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的特性》，姚小平譯，《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22-177 頁，此處第 158 頁。雷慕沙著《漢語語法基礎，或古文和官話（中華帝國的通用語言）的一般規則》（1822，巴黎）及氏譯《中庸》（1818，巴黎）、馬禮遜《華英字典》等文獻是洪堡進行漢語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⁵² [美]孟德衛（David E. Mugello）：《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江文君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 112 頁。

而成為受普魯士王室資助的“專技”人才。

在幫助二馮學習德語的同時，德意志學者方面嘗試以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新約》中譯本為底本，通過與兩位初通文墨中國人的合作，編撰字、音、譯文三位一體的語言學習文本，說明德方學習者識字與言說。儘管該模式最後證明並不成功。雙方合作成果——基督教內容中德文對照手稿的實用推廣性有限。但于中德語言文化交流而言，雙方的合作本身已是一種突破。德意志學者長期以來單方面開展的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終於有了中國人的參與，儘管此類參與仍然缺乏文化雙向交流所需的充分主動性。

From Showpieces to Collaborator: Fung Assing, Fung Aho and Early Sino-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act

Abstract

In the 1820s, two Cantonese, Fung Assing and Fung Aho, as public displays in the Germany. Its appearance aroused the popular interest i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language. After receiv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Prussian royal family, the two Cantonese lived for many years within Germany and were baptized as Christians. The German scholars, who interested in Chinese studies, used the Robert Morrison's Chinese version of *New Testament* as basic reference, and asked the two Chinese as collaborator in the compilation of bilingual documents. The bilingual documents have been preserved under their names, complet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Romanized Pinyin, and German version of *New Testament*. 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inity of characters, sounds, and translation point to a more plausible assumption that its purpose was to help the Germans achieve synchronized learning of written Chinese and spoken Chinese, rather than to help the two Chinese men understand Christianity or to enhance their German language studying.

Keywords: Fung Assing, Fung Aho, bilingual documents, Chinese version of *New Testament*,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或問』投稿規定

- 投稿資格は、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会員（入会は内田、又は沈まで）。
- 投稿論文は、原則として未公開の完全原稿とし、電子テキストとプリントアウトの両方を提出する。原稿は返却しない。
- 執筆者による校正は、二校までとする。
- 投稿論文は、本誌掲載後、他の論文集等の出版物への投稿を妨げない。
- 原稿作成に当たって、『或問』「執筆要領」を厳守する。
- 原稿料は支払わないが、雑誌を格安価格で提供する。

『或問』執筆要領

1. 使用言語は、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とする。
2. 字数は、16,000 字（400 字詰め原稿用紙 40 枚）までとする。
3. 簡単な要旨（原稿と異なる言語による）を付する。
4. 投稿は、所定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用い、表などは極力避ける。フォーマットは、沈国威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5. テンプレートを使用しない場合、テキストファイルの形で提出する。
6. 論文中に中国語などを混在させる場合、Windows は、微軟 Pinyin2.0（簡体字）、微軟新注音（繁体字）を用いること。
7. 注は、脚注を用い、文章の行中に（注 1）のように番号を付ける。
8. 参考文献は、下記の体裁で脚注に付けるか、或いは文末に一括して明示すること。

（単行本）

或問太郎、『西学東漸の研究』，大阪：しずみ書房，2000 年 10-20 頁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論文）

或問花子、「東学西漸の研究」，『或問』第 1 号，2000 年 2-15 頁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p. 531-549.

9. 本文や注の中で、文献に言及するときには、或問太郎（2000:2-15）のように指示する。同一著者による同年の論著は、2000a、2000b のように区別する。

内田慶市 (u_keiichi@mac.com)

沈 国威 (shkky@kansai-u.ac.jp)